

孙中山

与中国革命

上卷



〔美〕史扶邻 著
丘权政 符致兴 译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在近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大量研究著作中，本书要算最重要的一部了

——金冲及

这部著作对一个严酷的时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详尽和最具有权威性的

——〔美〕费正清

孙中山 上卷 与中国革命

〔美〕史扶邻 著
丘权政 符致兴 译

山西出版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 / (美) 史扶邻著; 丘权政, 符致兴译.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 - 7 - 203 - 07008 - 5

I. ①孙… II. ①史… ②丘… ③符… III. ①孙中山 (1866 ~ 1925) —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00996 号

SUN YAT - 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HAROLD Z. SCHIFFR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AND LONDON
1970

根据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 1970 年版译出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4 - 2010 - 035 号

Sun Yat - Sen
Reluctant Revolutionary
by Harold Z. Schiffri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1980

根据利特尔·布朗有限公司 1980 年版译出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4 - 2010 - 034 号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

著 者: (美) 史扶邻
译 者: 丘权政 符致兴
策 划: 李广洁 蒙莉莉
责任编辑: 赵虹霞 刘小玲
装帧设计: 清晨阳光 (谢成) 工作室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 - 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 - 4922127 (传真) 4956038 (邮购)
E - mail: sxskcb@163.com 发行部
sxskcb@126.com 总编室
网 址: www.sxsk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者: 山西出版集团·山西新华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3
字 数: 590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3 - 07008 - 5
定 价: 85.00 元 (上、下)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再版说明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杜鲁门和平研究中心主任史扶邻教授,是著名的孙中山研究的学者之一。他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两书的英文原著和中译本刊行后,立即在海内外引起热烈的反响,深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英文原著于1968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西方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对它赞扬备至。有的说:“史扶邻这本包括了孙中山头40年历史的书,是西方学术成就中的里程碑。”“应该是孙中山青年时期的标准著述。”有的说:“这是本世纪学术成就中不可替代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特地为这本书作序,并说:“这部著作对于一个严酷的时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详尽和最具权威性的。”1969年,这部书获美国史学会颁发的费正清奖。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英文原著于1980年由利特尔·布朗有限公司出版。此书一问世,与前者一样,得到了国外学术界广泛的好评。说这部书汲入大量珍贵资料,条分缕析地探讨孙中山一生行事、思想发展的轨迹及有关事件,称它和《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样,是最具权威性的、最详尽的上乘之作。史扶邻教授解释说,他称孙中山为“勉为其难的革命家”,“是从积极意义上使用这个字眼的,意谓孙中山不愿意充当革命者通常需要的无情残酷的角色”。换言之,孙中山宁愿谈判而不从事杀伐、求和解而不想进行旷日持久的斗争。他指出,当谈到一个献身革命并实际上曾多次发动武装起义和军事征讨的人物时,上述说法似乎是矛盾的。“但是,我认为孙中山不愿采用暴力手段而寻求达其目标的别的方法,体现了他的博爱精神。此外,我试图说明,孙中山所作的许多妥协,是内外环境使然。”金冲及教授说,“这个解释是可以接受的。”

倘若把上述两本书粗略地加以比较,很容易发现它们之间的不同之处:前者研究的是孙中山早期的活动和中国革命的起源,篇幅较大,有许多缜密细微的分析;后者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孙中山一生的历史,篇幅只稍多于前者的一半,这自然预示着它将更多地从大处着眼,着重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孙中山的生平和思想发展的基本线索,以及孙中山所生活过的那个时代。史扶邻教授在后者的《中译本序》中说:孙中山是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政治人物之一,“一般读者很想了解他的生平和时代,本书主要是为这些人写的”。同时,“希望学习和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生和学者,也能从本书找到一些有价值及有趣的东西”。

史扶邻教授的这两本书虽有上述的不同,但彼此又有一脉相承的地方。同一个作者的著作,通常总是保持他那独有的鲜明的个性。作者在前一本书中的优点,同样强烈地反映在后一本书中。后者的写法可以舍弃一些较次要的细节,篇幅更集中,它是作者又经过12年研究后写的,所以它的优点甚至比前者更突出。

鉴于上述,当1981年为纪念辛亥革命70周年,《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的中译本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初版,立即受到中国内地和台湾、香港的广大读者和学界的欢迎。为此,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又将此书再版,还出了精装本。史扶邻教授特为此写了《中译本序》。金冲及教授和章开沅教授为之写了《中译本前言》。

金冲及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一开头就指出:“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在近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大量研究著作中,要算是最重要的一部了。”他说,读一读史扶邻教授的这部著作,对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者来说,确实很有好处。它的好处,“我想至少有两点:第一,可以了解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研究状况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观点。第二,也可以从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金冲及教授还说,史扶邻教授的这部书“富有历史感。他把孙中山初期走过的道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并且力图探索和说明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这就比某些历史著作只罗列一大堆历史现象,或者作一些枯燥的静止的分析,要深刻得多,对读者也有吸引力得多”。金冲及教授还指出,这部书对中国读者来说,尤其容易引起兴趣的,是书中引用了“大量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档案,当时外文报纸上的评论、报道和其他外文材料,以及经过作者细心的分析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这对于我们了解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是很有帮助的。

章开沅教授也在本书的《中译本前言》中说,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这本书,从资料的丰富和论述的严谨两方面来看,都超过了以往在海外流行的几本孙中山传记。作者的功力之勤,不仅表现在从档案、报纸、口碑中广泛搜集资料,而且更表现在对于许多历史记述作了认真的考订”。章开沅教授还指出,史扶邻教授是一位严肃的历史学者,不像有些西方作者那样囿于所谓的传统的“价值观念”,把为殖民主义辩护的那一套“西方影响”等于近代化的简单模式强加于中国近代史。他力图从客观存在的历史实际出发,既看到西方文化对中国曾经起过的进步影响,又认真剖析列强对中国侵略的帝国主义性质。他没有过多地强调反洋教斗争和义和团运动的消极落后因素,而是认真说明这些斗争是殖民主义各种形式压迫所引起的强烈反抗,“这就与某些曾经流行过的西方出版的中国近代史著作大异其情趣”。

《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译本,于1996年由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此书一面世,就深得广大读者和学界的热烈欢迎和好评,称“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篇幅不大,但很精彩”;还有的说“史扶邻教授之《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系国际史学界公认的研究孙中山的扛鼎著作之一,持论之公允,史料之翔实,当无出其右者”。史扶邻教授为此书中译本的出版,前后写了两篇《中译本序》和《后记》。金冲及、胡绳武、黄石华、江绍伦四位教授为之写了《中译本前言》。

金冲及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中说,作者在《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中的重要优点,同样强烈地反映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一书中,甚至比前者表现得更突出。他还说,和《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样,在《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一书中亦引用了丰富的英国外交部档案、当时的外文报刊和私人通信中的材料,吸收了大量西方学者对孙中山研究的成果,不少是许多中国读者和研究者所不熟悉的。“这对我们研究孙中山和他的时代,特别是许多事件的国际背景是很有助益的。”

胡绳武教授也在《中译本前言》中写道:“我相信这部书的中译本出版后,对中国的读者会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广大读者会“从本书中找到一些有价值及有趣的东西”。

黄石华教授在《中译本前言》中还说:“我以为读者通过阅读史扶邻教授的这两本书,尤其是能窥见孙中山生平全貌的《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至少可得如下三方面好处:其一,可以了解西方史学界研究孙中山的状

况及他们所持的观点；其二，因作者所下工夫甚大，有关的第一手及重要的第二手资料搜集极齐全，故读者可从中获得不少迄今为止国内未见的新史料；其三，可受到启迪。”他还表示，他郑重地向海峡两岸同胞和全球炎黄子孙及所有尊崇孙中山的人们，推介史扶邻教授的研究孙中山的这部力作。

江绍伦教授也说，史扶邻教授的原著中译本的出版“意义重大，这给关心中国社会发展的有关研究者和读者，提供了多元性的史料和启发性的判断方法”。

由于上述原因，中国的广大读者和学界给予史扶邻教授的两本书极高的评价，认为它们“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人”。有的读者说：“1996年出版的《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中译本印数太少了，书店已很久见不到，欲求索而不可得。”由于两书中译本出版多年，广大读者四处寻觅而难于找到，故极有再版的必要。为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山西人民出版社很有见地，将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和《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的中译本合为一册，并将史扶邻教授精选的散见于海外书刊中他撰写的5篇有关孙中山研究的论文作为《附录》，结集出版，还与原作者史扶邻教授商定，将书名定为《孙中山与中国革命》，史扶邻教授还特地为本书作序。译者除对两部原译本再仔细审校外，还对书中的个别地方作了技术性的订正，务求更准确地表达原作者史扶邻教授的原意。金以林教授参与了《孙中山：勉为其难的革命家》的翻译工作。在这次再版过程中，得金冲及、胡绳武、章开沅、黄彦、黄石华、李小平等教授及山西人民出版社社长李广洁及蒙莉莉同志的热情帮助，在此一并致谢。

由于译者所见不周和受客观条件限制，对原著中的少部分引文未能找到资料加以核对，请读者引用时加以注意。

丘权政 符致兴

2010年6月8日于北京

中译本再版序言

对过去领袖人物的评价,往往因时代的变迁而改变。事后回顾这些人物,有一些声誉降低,而另一些则愈受赞美。孙中山就属于后者。当中国进入 21 世纪,他的思想、政治实践和远见,益见其卓识。在他同时代的所有政治领袖中,孙是最早和最重要的具有爱国热忱的民族主义者。然而,很少有人与他一样深信,一旦团结一致,中国就可以迅速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进而从事工业和技术的发展。他坚信,中国终将在世界强国中占其应有的地位。但是,他一再强调,中国必须统一,而此乃是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所以,他所做的是使中国南北统一,其晚年的北方之行,目的亦在于此。

孙中山的视角不只在于求中国政治统一这一目标,他要的是真正的统一,修建许多公里的铁路和公路,由此不仅促进工业的发展,而且克服地理上的障碍,从而使中国人民紧紧连在一起。许多传记作者,包括我自己在内,均认为他的修建铁路的计划不切实际。但是,我们都错了。有谁料想到,他的要修建一条直通拉萨的铁路计划,竟然实现!这一工程奇迹,是中国人民有独创性的一次实践,对此孙中山是不会感到诧异的。

孙中山对中国人民的潜能充满自信。他不仅是个民族主义者,而且是位国际主义者。他的中国现代化的视线,在这个全球化的时代尤其适当。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实现中国现代化的计划谓“实业计划”。尽管受外国人的凌辱,他从未怀有排外情绪。相反,他期望和欢迎利用外国资本,但这是有条件的,就是中国要完全行使主权及能确定外国投资的期限。

他还预见到现代化时代各国的互相依存的关系。首先,他深信,并试图使世界各国领导人也确信,一个现代化的统一的中国,是一种有益于世界和平的力量,而不是威胁。

孙中山还预想在中国发扬民主,建立一个基于公平正义的、没有贫富悬

殊的社会。凡此,至今仍在激励着中国人民。

最后,孙中山个人的诚实正直,他的长达 40 年的政治生涯未被贪腐玷污,这仍是中国政治领导人适用的典范。

史扶邻

2010 年 3 月 25 日于

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

目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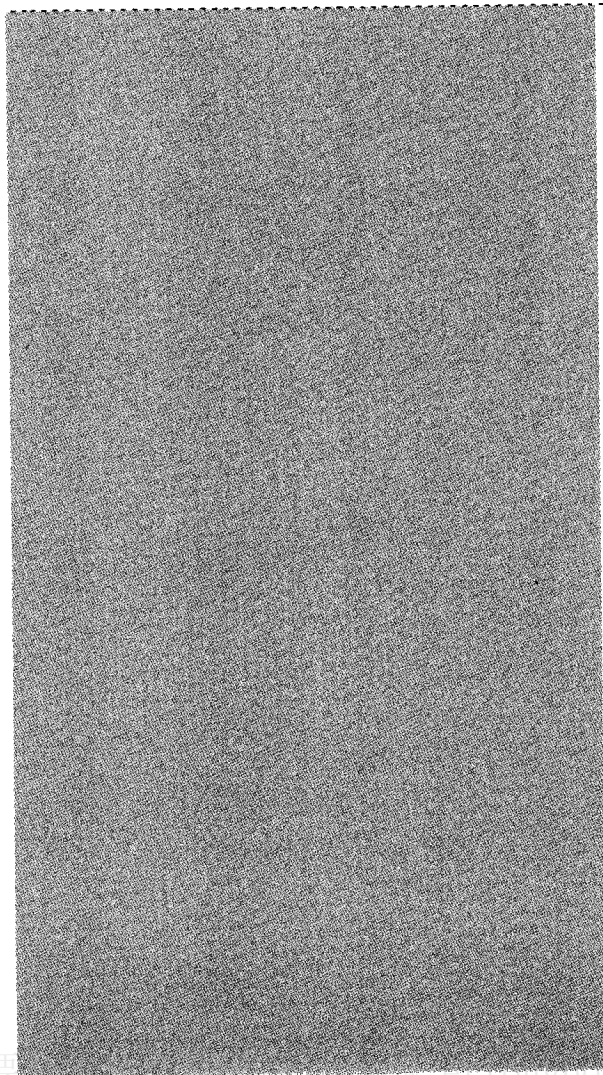
上卷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 中译本前言（一） 金冲及 /3
中译本前言（二） 章开沅 /10
中译本序 史扶邻 /13
- 一、导言 /14
 - 二、孙中山：早期的影响 /20
 - 三、兴中会的建立 /40
 - 四、1895年的广州密谋 /50
 - 五、伦敦蒙难 /77
 - 六、东京。对大陆的重新渗透 /106
 - 七、李鸿章、卜力与何启 /131
 - 八、惠州起义 /154
 - 九、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 /180
 - 十、民族主义和革命的语言 /198
 - 十一、孙中山：一个新的转折 /209
 - 十二、建立同盟会 /237
- 书目索引 /253

孫
中
山

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



中译本前言（一）

金冲及

史扶邻教授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一书，在近年来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大量研究著作中，要算是最重要的一部了。

本书1968年由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后，立即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广泛重视。西方报刊纷纷发表评论，对它赞扬备至。有的说：“史扶邻这本包括了孙中山头40年历史的书，是西方学术成就中的里程碑。”“应该是关于孙中山青年时期的标准著述。”有的说：“这是本世纪学术成就中不可替代的、也是必不可少的重要著作。”美国的中国问题权威、哈佛大学的费正清教授特地为这部书作序，并说：“这部著作对一个严酷的时代中的重要人物所作的描述，是最详尽和最具有权威性的。”

丘权政、符致兴两位同志做了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把这本书译成了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读一读史扶邻这部著作，对我们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和研究的工作者来说，确实很有好处。它的好处，我想至少有两点：第一，可以了解西方历史学家对孙中山的研究状况以及他们所持有的观点。第二，也可以从中受到一些有益的启发。这里，我想着重就后一方面来说几句。

史扶邻这部著作第一个重要的优点是：富有历史感。他把孙中山初期走过的道路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发展过程来考察，并且力图探索和说明事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发展。这就比某些历史著作只罗列一大堆历史现象，或者作一些枯燥的静止的分析，要深刻得多，对读者也更有吸引力得多。

史扶邻在本书的《导言》中，一开始就给自己规定了明确的任务。他说：“他（指孙中山）是主要由中国知识分子组成的政治运动的第一个非仕宦出身的领袖。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孙中山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取得这种领导地位的？”本书以下各章，大体上就是按照这条线索渐次展开论述的。

孙中山是怎样走上革命道路的？

长时期来曾经流行过一种说法：自从中法战争之后，孙中山便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了。以后的一切，仿佛只是朝着他预定的目标前进。这中间，既没有矛盾，也没有曲折。甚至连他上书李鸿章，也被解释成只是借此北上，以窥清廷的虚实。这种说法，显然并不符合客观的历史实际。

一个人的思想发展，往往需要经历迂回曲折的道路。特别是一种新的社会政治思想的产生，要冲破社会上各种传统思想的束缚，更不可能一开始就走上一条笔直平坦的大路。当反动统治势力还貌似强大的时候，一个知识分子要下决心抛弃自己已取得的那点社会地位，冒着杀头破家的危险，领头起来革命，哪里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它不仅需要有一个严肃的思考和摸索的过程，而且当他最后下定决心前，内心常常充满矛盾，甚至会出现一些曲折和反复，这倒是很自然的事情。孙中山的青年时代，正是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

史扶邻没有采取那种简单化的办法，而是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个过程的复杂性。

他在描绘了孙中山“赤贫如洗”的童年时代和他在夏威夷受到西方式教育以后，接着指出：尽管他当时深深地为自己民族的处境忧虑，热望能革新中国的政治，可是直到他开始学医的时候，他的内心依然充满着矛盾。他学医的决定，“表明他还不知道怎样使他的职业同他的新的政治觉醒协调起来”。

当孙中山到香港雅丽氏医院附属医校学习后，他开始同几个友人高谈革命，号称“四大寇”。这就是孙中山自己说的：“此为予革命言论之时代也。”史扶邻正确地指出：在这时，还不能“过分强调孙中山在密室中反对清王朝的激进情绪”，“作为一个接受了几乎全部西方教育的人和一个现代医学潜在的先行者，孙中山所具备的条件使他更多地求助于支持清王朝的改良主义者，而不是更多地求助于三合会”。

甚至到了1894年，也就是他已向陈少白、郑士良等少数人提出成立“兴中会”的建议以后，他的内心依然存在着矛盾：“有迹象进一步表明，在下决心从事革命活动之前，孙中山对于同改良主义的权贵结盟一事，曾作了最后的一次尝试。”这个尝试，就是1894年的向李鸿章上书。“然而，此行的失败，终于促使他不再犹豫了。改良主义的可能性已被消除。从此以后，他唯一的目标就是推翻清王朝的统治。”

自然，在史扶邻的论述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但他笔下的孙中山，总的说来，既不是什么天生的圣人，也不是什么单凭个人意志、随意创造历史的超人，而是一个使人感到亲切的、可以理解的现实生活中的人。他是一个伟大的

革命先行者；他又是在客观形势的推动下，经过内心的矛盾冲突，经过实践的反复探索，才最后走上革命道路的。史扶邻对孙中山早期思想发展进程所作的这些基本观察以及他的某些重要论断，无疑对我们研究这个问题是很有启发的。

我们再来看，在这以后孙中山又怎样一步一步成为当时中国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的？

考察这个问题，需要把视野推到更广阔的领域中，不局限于对孙中山个人经历的观察和分析，同时要注意到19世纪和20世纪相交那10年间，整个中国所处的客观形势和内部社会力量配备发生了哪些变化？

孙中山革命活动的开始，标志着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开始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但在19世纪末年，这种力量在国内的基础还是太薄弱了，一时还不能构成一种可以在中国社会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力量。这种力量对比的状况，自然导致孙中山自述中所说的：“由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内地之人，其闻革命排满之言而不以为怪者，祇有会党中人耳。”到了20世纪初年，两个重要的变化发生了：一是经过甲午战争，经过八国联军之役，中华民族的处境更加恶化了。二是随着国内资本主义近代工业的初步发展，随着大批派遣留学生和废科举、兴学堂，一个人数众多的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队伍空前壮大起来了。这是一个不同于旧式封建士大夫的新兴的社会力量。他们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经过激烈的斗争，终于大批走上革命的道路。只有在这时，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成立的条件才告成熟。早就举起民族民主革命大旗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也就十分自然地成为这个革命政党公认的领袖。

史扶邻在相当程度上注意到了这个过程。

他指出：当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时，他的经历和所受的教养同国内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不相同。“他始终只是一个农民出身的持有外国学校毕业文凭的人。”书中作了一个有趣的比较：“在他那一代，也许还有别的中国人比他更熟悉西方的思想、语言和制度。然而，以孙中山来说，他是只靠西方的学识取得知识分子的地位的。其他的人先读孔子和朱熹的书，然后才解释达尔文和穆勒的学说。至于孙中山，诚如我们看到的，在他身上这个程序是相反的。”因而很自然，当时他的奋斗只能是相当孤独的。长时间内，在国内一般士大夫眼中，甚至“只把孙当成一个‘江湖大盗’，并且怀疑孙中山不识中国字”。“即使在惠州起义取得很大胜利后，倾向孙中山的也不是很多，而是很少。”

情况是怎样发生变化的？史扶邻表现出了相当犀利的历史眼光。他用很多

笔墨,详细地记录了20世纪初中国新式知识分子队伍迅速扩大、特别是留日学生人数急剧增加的事实,并且刻画了他们在这个时期思想上从爱国到反满的迅速变化。“而当他们最后的抉择是反满时,孙中山的主张也就变得比较容易接受了。”

对这个过程的论述,是史扶邻全书中用力最多的地方,构成了全书的基本特色所在。尽管其中也有一些值得商榷的论断,但应该说,这个叙述大体上是接近客观实际的。他在《导言》中,不是提出“本书的目的,就是要说明孙中山是在什么条件下怎样取得这种领导地位的”吗?应该承认,本书对这个问题所作的历史考察,至少提供了一种比较系统的、能够自成一说的答案。

史扶邻这部著作第二个重要优点是:他把个人传记同对当时整个历史环境的考察结合起来。写的虽然是孙中山的传记,读者却能从中看到一个时代,并且多少感觉到了时代脉搏的跳动。

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自然是前面刚说到的,他在论述历史进入20世纪时,特地拿出两章的篇幅(第九章《学生和流亡知识分子》,第十章《民族主义和革命的语言》),来描写当时聚集在东京和上海的分子的状况和他们的思想变化。孙中山本人的活动在这两章里几乎完全没有提到。这是不是离题了呢?不是。因为不了解这些,就不可能懂得中国同盟会怎么会产生,也不可能了解孙中山怎么能成为当时革命党人公认的领袖。

就是对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论述,史扶邻同样也很注意对当时历史环境的描写。例如,在《1895年的广州密谋》这一章里,他先用不少篇幅来刻画中日甲午战争给广东社会带来的巨大动荡。这对帮助读者了解孙中山为什么能组织和发动这样一次起义,他所依靠的力量是什么,无疑都很有必要。再如,他在叙述孙中山在夏威夷求学的经过时讲道:“由于意奥兰尼书院支持夏威夷的独立事业,抨击亲美的吞并主义者的图谋,因此,它也许应对孙中山后来产生亚洲人必须抵抗西方侵略的政治观念负责。”而当讲到1894年11月孙中山创立檀香山兴中会时,又指出:“在筹备成立兴中会的那几个月里,夏威夷变成了一个共和国。新宪法在1894年7月生效,孙中山和华侨中那些具有政治觉悟的人,对于伴随这个共和国的诞生而来的政治变革是不可能不在意的。”这些地方虽然只是寥寥数笔,却都表现了作者具有相当敏锐的历史眼光。

把传记主人公的个人经历同他当时所处的整个历史环境结合起来考察,必要时甚至不惜以较多笔墨来专门描述并剖析这种历史环境,应该说,这是一部好的历史传记作品必须具备的条件。因为:第一,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对传记主人公在各

个时期为什么会这样或那样地思考问题和采取行动,得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而不致把它看作只是个人随心所欲的决定。第二,才能使读者对传记主人公在整个历史变动中所占的地位作出比较客观的估计。第三,还可以使读者通过阅读这部著作,从一个侧面看到整个时代,从而获得更丰富的历史知识,领略更多发人深省的历史教训。史扶邻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对我们也是很有启发的。

史扶邻这部著作第三个优点是:他在写作过程中,勤奋地搜集了他所能得到的一切历史资料,其中包括当时的外交档案、警察报告、外文报刊,以至个人访问材料等。并且对他得到的资料,尤其是相互并不一致的资料,进行了认真的考订,作出自己的判断。

对中国读者来说,特别容易引起兴趣的是,这部著作中引用的大量英国政府和香港当局的档案,当时外文报纸上的评论、报道和其他外文材料,以及经过作者细心的分析比较后得出的结论。这对我们了解某些历史事件的真相是很有帮助的。

举例来说:惠州起义时孙中山的军事部署是很违反常理的。他突然改变计划,命令起义部队不要向广州进发,而向厦门转进。为什么这样做?孙中山自己有过一段解释:“时台湾总督儿玉颇赞中国之革命,以北方已陷于无政府之状态也,乃飭民政长官后藤与予接洽,许以起事之后,可以相助。”看了这段解释,人们仍然留下不少疑团。史扶邻的著作中引用了直接参与其事的山田良政的弟弟山田纯三郎对这个事件的详细叙述,并且一针见血地指出:“而更为可能的是,日本人对厦门的骚乱比对广东的骚乱更感兴趣。8月和9月,他们全都做好了接管厦门港的准备。倘若孙中山来接管,特别是如果他擅自取用这个银行的金库,那么他们就会处于有利的地位。”“关于日本人密谋在8月底夺取厦门,以及后来因担心欧洲舆论的反对而放弃这个密谋的讨论,也见英国人关于8月24日日人在厦门挑衅的报告。”

这下事情就很清楚了,儿玉布置的原来是一个圈套。要是孙中山真的听信后藤那些诺言,进入厦门,动手取用台湾银行的金库,日本当局就可以以此作为借口,出兵“夺取厦门”。后来只是“因担心欧洲舆论的反对”,才“放弃了这个密谋”。这就使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能有一个比较正确的了解。

在第五章《伦敦蒙难》中,史扶邻教授引用了大量英国政府档案和英国报纸记载,对这个事件的前后经过,包括许多细节作了详尽的描述。在第七章《李鸿章、卜力与何启》中,他以同样丰富的资料,详细地描述了义和团运动期间英国政府在华南地区的种种政治策划。这些,也都是很能引起中国读者兴趣的。